

全球史視角下的殖民帝國史研究： 以新加坡和香港的錫克警察 為中心的探討

• 曹 寅

摘要：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英帝國各殖民地工作的錫克警察，是全球史研究一個很好的樣本。這些錫克人本身是被殖民者，但他們又被英帝國政府招募至其他殖民地充當殖民秩序的維護者。這一雙重身份使得國族史和殖民帝國史的敘述範式都無法準確客觀地重現他們的歷史。本文試圖通過強調英帝國殖民地之間的多層級聯繫，特別是香港和新加坡兩地警務部門以及錫克移民社群的互動，來重新建構作為殖民警察的錫克人的歷史。本文認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帝國各殖民地之間的人員、信息和知識的流動促成了各地錫克警察部隊的形成與發展。但到了1920至1930年代，跨國網絡卻又促進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傳播，因而迫使各殖民當局開始監視和控制其下屬的錫克警察。這種監控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關鍵詞：錫克警察 新加坡 香港 全球史 殖民帝國史

一 導言

1897年5月22日早晨，錫蘭（今斯里蘭卡）首府科倫坡警察總部外的操場上，一隊來自錫蘭、新加坡和香港的警察正在操練。在隊列中，香港的警察部隊並不僅僅是由中國人組成，還包括了10名錫克警察，而在新加坡的隊列中也可以見到24名錫克人。幾天之後，這些警察將會登上前往倫敦的輪船，去參加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的慶典^①。

十九世紀末的日不落帝國正處於其鼎盛時期，其殖民地遍布全球。因此，新加坡和香港殖民政府派遣其優秀的警務人員去參加女王的登基慶典並以此彰顯日不落帝國的榮耀，本是不難理解的。但值得深思的是，為甚麼香

港和新加坡這兩個以華人為主要人口的殖民地的警隊中會有生活在印度西北部旁遮普地區 (Punjab) 的錫克人？是甚麼原因促使這兩個殖民地的政府招募千里之外的錫克人來擔當警察？歷史學家如何去理解這一現象？錫克人為甚麼會願意背井離鄉來到異地擔任警察？他們到達當地之後怎樣工作和生活？為了解答上述問題：本文認為有必要對以往學界常用的殖民帝國史敘事範式加以全面檢討，並以全球史研究方法重新審視錫克警察在英帝國亞洲殖民地的歷史。

本文認為以往關於殖民警察的研究往往會受困於兩個問題：一是過於強調殖民地母國（以下簡稱「母國」）與單個殖民地之間的雙邊聯繫，而無法將英帝國視為一個各部分相互聯結的網絡加以研究；二是深陷於自上而下的視角，過於強調殖民者在殖民警察制度形成中的作用，而忽略被殖民者自身的主體性及其對於殖民制度的影響。通過將新加坡與香港的錫克警隊的形成與發展等問題放在全球史的視角下加以考察，本文試圖更加客觀地展現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存在於亞洲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間的一個相互聯結、相互影響的多層級網絡^②。

二 從殖民帝國史到全球史

關於東南亞和東亞地區錫克警察（又作「錫克巡捕」）的研究，可以歸結到近代殖民帝國史 (the Imperial History) 的學術史框架之中^③。以往殖民帝國史的研究者傾向於將他們的研究對象分為兩個部分加以探討，即母國與殖民地；當研究這兩者的聯繫時，學者只是着重於探索母國如何影響殖民地^④。在這一範式中，被殖民者或者被簡單地形容為受到西方殖民者壓迫和剝削的受害者，又或者被視為西方輸出並試驗他們的「現代」制度、「現代」科學以及「現代」理念的實驗室；至於（前）殖民地國家，官僚制度、社會管理理念以及經濟生產方式皆是模仿或者是進口自西方世界，它們只是被動地接受這些西方的、現代的事物而已。過去我們對殖民警察的研究也是深深根植於這樣的一種範式之中，警察被認為是一種源自於西方的現代社會控制制度。當西方國家在其殖民地建立統治之後就引入了警察制度，以此來強化他們對當地社會的管治^⑤。

然而，學者們逐漸認識到了上述研究範式的缺陷。首先，全球範圍內殖民地的多樣化並沒有被該範式所考慮到。當引入西方事物時，各個地區當然會根據自身的特異性而將這些外來事物本土化，因此使得這種殖民帝國史的研究範式顯得過於簡單。其次，被殖民者的主體性在這一範式中被完全抹滅。被殖民者被視為沒有創新能力的、停滯不前的、落後原始的行為體。只有當殖民者來到這些地區，給那些非西方民族帶來所謂的「啟蒙思想」和「現代科技」之後，他們才能夠邁出「黑暗的中世紀」而進入現代社會。綜合這兩個方面來看，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以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關係在殖民帝國史的範式下被簡化甚至是曲解為「衝擊—回應」模式，而在這一二元結構中，被殖民者是永遠無法被承認為具有自我主體性的^⑥。

自1980年代以來，學術界展開了對殖民帝國史研究範式的反思和批判，並在此基礎上出現了一批用新的方法和視角來研究殖民帝國史的論著。這些運用了與以往不同的研究範式所寫成的著作又被稱為「新殖民帝國史」(the New Imperial History) ㉞。新殖民帝國史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強調殖民帝國的回歸，即殖民地以及殖民地人民對於母國所施加的影響。這一新的範式認為殖民主義不僅僅是影響了殖民地及其人民，同時也改變了母國。從文化上看，在全球範圍內的殖民經驗重塑了西方文學與藝術，並改變了西方人對他們自身的認識㉟。從政治角度看，在西方國家向世界其他地區輸出民族主義、無政府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的同時，非西方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反殖民主義運動和反帝國主義運動也極大地改變了西方的政治版圖㊱。

受到這一思潮的影響，從事殖民警察研究的學者逐漸認識到西方國家在殖民地的統治經驗在很大程度上也改變了殖民地母國政府對他們自己人民的管治。某些研究甚至顯示倫敦和都柏林警察的社會治安維持措施與理念其實深受英帝國殖民警察的影響㊲。此外，與以往的殖民帝國史研究不同，新範式提倡跳出母國與單個殖民地之間的雙邊互動模式，而在一個跨國網絡的多邊框架下對殖民帝國進行重新審視。在這一跨國網絡中，人員、商品、知識與制度得以在母國與各個殖民地之間流動㊳。

總而言之，新的範式對於以往的殖民帝國史進行了全方位的反思與修正。通過強調殖民帝國對於母國與殖民地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殖民帝國史力求消除殖民地總是受制於母國這樣的歐洲中心主義觀。但「母國—殖民地」的二元對立結構卻仍然存在於新範式之中。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研究者的注意力從殖民地轉回母國後，以往被殖民帝國史視為中心的「西方」在新範式中反而被強化了。以此看來，新殖民帝國史所提倡的在跨國網絡下研究殖民帝國的方法並沒有得到展開，西方仍然處在中心位置，而非西方世界則依舊是在邊緣。

儘管新殖民帝國史仍然無法擺脫舊範式的制約，但它所提倡的跨國網絡與多邊框架卻呼應了1980年代以來日趨成長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研究方法㊴。與殖民帝國史所一向強調的「母國—殖民地」雙邊關係不同，全球史力圖將世界各個地區的歷史進程放在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中加以考量，以便能更全面客觀地展現特定區域的歷史是怎樣由於人員、商品、知識與制度的流動而發生變化的㊵。通過運用這種方法，學者期望有效地去除根植於以往研究中的歐洲中心主義史觀。

實際上，當研究殖民警察的歷史時，某些研究已經注意到了包含在該議題當中的跨國因素。例如，有學者指出英國殖民地尼亞薩蘭(Nyasaland，今馬拉維共和國)的第一所警察學校實際上是由一位在南非警察部門供職了十年的英國軍官幫助建立的。而該地警察部門在1940年代的改革則是由一位在巴勒斯坦警察局工作了十四年的警官主持的㊶。除了最易被觀察到的人員交流之外，管治措施與理念也在跨國網絡中流動㊷。當肯尼亞殖民警察最初建立時，從印度招募而來的警員佔了絕大多數，該地警察部門的建制規模和規章制度也都模仿自印度㊸。在也門的英國殖民地亞丁(Aden)，殖民當局特別要

求從其他地區招募有經驗的警務人員，以向當地的警察傳授技能和知識^①。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各地殖民警察部門的建立和發展都只有放在人員、知識與制度的跨國流動中才能較全面地被理解。可惜的是，上述的研究仍然局限在人為設定的國族史的框架之中，因此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尼亞薩蘭警察史」或是「肯尼亞警察史」，着重強調的則是母國如何在特定的殖民地（獨立後成為民族國家）境內建立和發展其警察機構，並以此對當地人民進行監控和彈壓；對於殖民地之間以及殖民地與其他非西方地區的聯繫和互動則未進行深入探討。即使是研究者所提及的跨國人員之間的流動，也僅限於擁有較高社會地位的西方人，而對於那些社會中下層的個體（無論是西方人還是非西方人）的故事卻甚少關注^②。

綜上所述，即使學者已經意識到了他們的研究對象中包含着跨國因素，儘管他們試圖突破殖民帝國史的二元結構範式，但他們所依託的國族史敘事方式卻限制了他們的視野。換句話說，在民族國家的歷史敘事結構之下，對於人員、商品、知識與制度的跨國流動研究無法超越舊有的二元範式。為了打破這種國族史研究框架的桎梏，並將殖民帝國史研究從「母國—殖民地」的垂直結構轉化為以跨國網絡為主體的水平結構，從全球史的角度來對跨國因素加以研究是既緊迫又必須的。但是，我們如何可以將全球史的研究範式運用在具體的殖民帝國史的探索中呢？

在對舊有範式進行批判的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突破是將西方世界多元化和邊緣化。換句話說，即既承認西方本身的多元性，也強調西方僅僅是整個近代世界體系的一部分^③。從這點出發，本文認為當研究某個具體的殖民帝國時，我們也不應當將其視為一個不可再化約的整體來看待；反之，這個帝國本身也可以被認為是一個由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的網絡。在這個網絡之中，母國不再是中心而僅僅是偏居於其一隅。如此一來，原本界限分明的西方與非西方、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以及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便模糊了起來。下文將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活躍於新加坡和香港的錫克警察作為一個範例，力圖展示有關殖民地的人員、商品、知識與制度是怎樣在以英帝國為主體的跨國網絡中流動的，以及這些流動怎樣形塑了兩地的錫克警察部隊。

三 錫克殖民警察的誕生：殖民網絡與錫克移民網絡

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尤其是1857年印度王公兵變（Indian Mutiny）之後，英帝國政府逐漸改變了以往對其亞洲殖民地進行間接統治的政策，而改由倫敦的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希望以此來加強統治。但當時各個亞洲殖民地的安全形勢都不容樂觀。例如，馬來亞和海峽殖民地（1826至1946年間英國統治下主要由新加坡、馬六甲、檳城三地組成的殖民地，1832年後其首府常設在新加坡）華人秘密社團經常性的暴動已經嚴重威脅到殖民政府在當地的統治^④，而猖獗的走私活動更是掏空了政府的稅收^⑤。這些不安定因素使得殖民政府不得不將其很大一部分的財政收入用在社會管制方面，從而限制了殖民地社

會的全面發展。例如在1880年，海峽殖民地花費了3,963墨西哥銀元^②在教育方面，41,520銀元在社會醫療方面，而新加坡一地在警察方面的支出高達116,368銀元^③。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此巨額的支出並沒有給殖民地的治安帶來根本性的改善。因此，如何強化各殖民地的警察部隊成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而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問題則是何種人更加適合在亞洲殖民地執行警察任務。

歷史上，大多數殖民帝國都不傾向於在其殖民地大規模招募西方人作為警察，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殖民地直接招募當地人充當警察遠較從殖民地母國招募警察廉價。例如，在1890年代的新加坡，一個馬來警官的年收入僅有360墨西哥銀元，而僱用一個歐洲警官則需要720銀元一年^④；其次，西方人無法迅速適應熱帶和亞熱帶地區殖民地的環境，因而導致了極高的缺勤率^⑤；再者，西方警察的表現也往往未如理想，很多只不過是失業的水手或者是逃兵，對於警察工作一無所知。海峽殖民地警察總署在1870年代對於其下屬歐洲警察的評價是，「這些流民是因為甚麼都不會做才加入警察部隊的，如果再招募這些人，那麼對於整個殖民地來說都將是一場災難。」^⑥由於這些原因，當地人逐漸成為了各殖民地警隊的中堅力量。

儘管當地人薪水低而且熟悉環境，但是在殖民者眼中他們卻非常「不可靠」^⑦。在1879年海峽殖民地警察總署的年度報告中，一位殖民官員指出當地警察的工資待遇已經低到了無以支撐他們日常生活的地步。為了獲取更多的收入，幾乎所有當地警察都會接受賄賂，甚至與犯罪集團合作謀取錢財^⑧。為了避免這些隱患並節約成本，大多數殖民當局採取了「以夷治夷」的政策，即在一個殖民地招募人員去到另一個殖民地充當警察。如此一來，因為不熟悉當地語言，殖民警察便無法與當地人聯合起來做出不利於殖民當局的事。例如，亞丁的警察局在1965年之前都拒絕聘用當地人，而是以阿拉伯半島上的貝都因人(Bedouin)作為主要招募來源^⑨。十九世紀後半期，巴哈馬的警隊則主要是從非洲和巴巴多斯(Barbados)招募人員構成^⑩。二十世紀初期，在坦桑尼亞最大的城市達累斯薩拉姆(Dar es Salaam)，殖民當局表示要將當地人從警隊中完全清理出去^⑪。這種「以夷治夷」的政策在英帝國的殖民網絡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並也在其亞洲殖民地中得到了貫徹。又因為印度被視為英帝國在東方統治的基石，印度培訓的軍官和印度僱傭軍廣泛地分布在西起索馬里東至上海這一廣袤的地區，以維護英帝國的經濟政治利益^⑫。基於同樣的考慮，印度人也因此被招募到了肯尼亞、毛里裘斯、馬來亞等地維持當地秩序。

但在殖民者眼中，並非所有的印度人都適合被派駐到海外。實際上，當各殖民地打算從印度招募人員去當地維持治安時，只有那些被認為屬於「軍事族群」(Martial Race)的印度族群才會被予以考慮^⑬。根據美國東北大學教授斯特雷茲(Heather Streets)的分析，「軍事族群」這個理論源自於十九世紀的西歐，是達爾文進化論與殖民主義混合而成的產物。「軍事族群」理論認為某些人類種族在生物體徵和文化意義上較其他種族更加擅長從事軍事活動^⑭。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在西方所創造出的「軍事族群」理論中，錫克人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一般而言，錫克人是指生活在旁遮普地區以錫克教為信仰的族群^⑤。早在兩次英國—錫克戰爭 (the Anglo-Sikh Wars, 1845-1846、1848-1849) 期間，錫克戰士的英勇表現就給當時參戰的英國軍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英國殖民者自那時起就深信錫克人擁有非常高的軍事素養與戰鬥精神。不過由於擔心他們的可靠性，印度殖民當局直到1857年王公兵變前都沒有大規模地招募錫克士兵和警察。在1857年的兵變中，錫克人並未加入印度王公領導的起義軍，而是給予了殖民當局很大的支持，因而取得了英國人的信任。通過將他們的好戰特質與對英帝國的忠誠結合起來，錫克人在1850年代之後被正式定義為「軍事族群」，並充當了英帝國在亞非地區殖民擴張的先鋒^⑥。

與此同時，有關錫克人能征善戰、紀律嚴明的信息也在英帝國各個殖民地之間傳播了開來。斯特雷茲有關英國軍隊和大眾傳媒關係的研究揭示了錫克人作為「軍事族群」這一知識是怎樣在世界不同地區之間流傳的。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印度殖民地的英國軍官撰寫了大量有關錫克戰士優良品質的書籍和回憶錄，以此來向外界證明他們在印度軍隊中廣泛招募錫克人政策的合法性^⑦。這些印刷品在印度之外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使得其他殖民地了解並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此類媒介中所試圖表達的信息——錫克人是身體強壯、耐性極高、紀律嚴明的「軍事族群」，適合從事各種與軍事和安保相關的工作。

除了印刷品之外，英帝國殖民地之間的人員流動也給信息與知識的傳播創造了條件。例如英國人傑克遜 (Henry M. Jackson) 曾在1880至1884年間擔任塞拉利昂殖民地的警察總監，之後他被調到巴哈馬擔任殖民地秘書，並完全參考塞拉利昂的警察制度對巴哈馬警察部門進行了改革，而且大量僱用了曾在塞拉利昂警局工作的人員^⑧。與之相似，由於肯尼亞殖民地的官員大多曾在印度長期供職，該地警察部門也是完全模仿印度的制度建立起來的^⑨。而在1870年代的香港，警察總監威菲路 (Henry Whitfield) 堅持要求招募加勒比海地區的黑人來充當警察，原因則是他曾在加勒比海地區服役多年，對該地黑人警察的表現印象深刻^⑩。基於同樣的道理，當在印度服役過的官員被調往其他殖民地時，他們所掌握的有關「軍事族群」的信息和知識也隨之傳播到不同派駐地。而當這些官員一旦在新崗位上掌握了權力，他們也更願意將以往的經驗運用在派駐地的管理工作之中。總而言之，通過印刷品和人員的流動，有關錫克人的知識與信息得以在遍布全球的各殖民地之間傳播。因此，許多亟需加強本地治安管理的殖民地官員對這些身材魁梧、紀律嚴明的錫克人產生了興趣。

根據上文我們可以得知，依託英帝國形成的跨國網絡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促進了人員、商品、知識與制度的流動與傳播。曾在印度服役的殖民官員將他們在印度的工作經驗以及獲得的知識帶往其他殖民地，並使之逐漸本土化。而印刷品在網絡中的流通則有利於各殖民政府迅速地掌握相關的知識和信息。在本研究中，所有的這些流動並不是圍繞着母國 (英國) 為中心進行的，取而代之的則是由一個個殖民地組成的跨國網絡。從這方面看來，以往基於母國來對殖民帝國史加以研究的歐洲中心主義範式受到了挑戰。英帝國不再是一個由母國 (中心) 與各殖民地 (邊緣) 的互動所構成的垂直型線性系統，而是一個包括了母國與殖民地在內的扁平型網絡系統。

不過，上述的殖民網絡視角僅僅只能對錫克人的跨國流動提供一個由上至下的片面解釋。換句話說，這種由殖民者主導的人員和知識的流動僅僅為錫克警隊在各地的建立創造了一個必要非充分條件。但錫克人本身並不是「無聲的物體」(voiceless subjects)，任由殖民者通過其網絡進行招募、培訓及部署。在殖民網絡視角下，錫克人在移民過程中的主體性並未得到應有的體現。

基於上述反思，本文認為在從上到下的視角之外，我們還需要一個從下至上的視角去理解為甚麼錫克人願意移民到其他地區充當警察。自1840年代旁遮普被英國吞併之後，該地的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水利灌溉設施、運河以及鐵路的大規模修建使得旁遮普的農作物產量大幅度提高並得以銷往印度各地^④。豐厚的利潤吸引了大量資本湧入旁遮普，土地日益被兼并到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地主手中。而作為中小農的錫克人則因為無法進行規模生產而被逐漸邊緣化^⑤。為了擺脫貧困，多數錫克家庭會選擇讓其家族中的年輕男性去海外尋找工作機會，並以其收入補貼家用。借助於已有的殖民網絡，錫克移民得以穿梭於各個殖民地之間。隨着移民的逐漸增多，各地的錫克社群也相繼建立，連接着旁遮普和各個海外社群的錫克移民網絡也隨之誕生。正如殖民網絡極大便利了各殖民當局的人員和信息交往一樣，錫克移民網絡使得散居在世界各地的錫克人可以通過郵件、口信以及印刷傳媒的方式快速共享信息，並因此影響了錫克人在移民過程中的判斷和決策^⑥。由於東南亞和東亞等地對於錫克警察的需求普遍較高，錫克人對於移民目的地的選擇無可避免地引起了各殖民地之間的相互競爭，甚至從根本上改變了某些殖民當局的招募政策。

綜上所述，錫克殖民警察在英帝國各殖民地的形成必須從殖民網絡(從上至下)與移民網絡(從下至上)兩個視角加以分析，而這兩個網絡其實又是相互重合、相互影響的。換句話說，包含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內的跨國網絡是一個多層級的系統，而且各個層級之間又是存在着諸多交叉的。殖民網絡為移民提供了必要條件和需求，而錫克移民則利用英帝國提供的便利交通和通訊不斷地追求自身的利益，並在此過程中重新形塑了殖民網絡。下文將在多層級跨國網絡的視角下探討新加坡和香港兩地錫克警察部隊的建立與發展，並在此基礎上展示全球史方法對於研究跨國對象的重要性。

四 從維多利亞港到新加坡河：流動中的錫克警察

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1839-1842)，印度士兵就被派往了中國作戰。但這些印度士兵大多數並非「軍事族群」，而是來自馬德拉斯(Madras)或孟加拉邦(Bengal)的農民。隨着戰爭的結束以及《南京條約》的簽訂，香港島被割讓給了英國，而一些印度士兵也作為戍衛部隊留在了香港。最早的香港警察部隊正是由這些印度戍衛士兵以及一些英國水手組成的^④。然而，殖民當局很快便發現這些人完全不適合從事警察的工作^⑤。1860至1870年代擔任港督

的麥當奴 (Richard MacDonnell) 將香港的警隊形容為他有生以來所見過的最為腐敗低效的組織。對於警隊表現的不滿以及對太平天國運動可能在香港造成騷亂的擔憂促使麥當奴下決心徹底改革香港警隊^{④⑥}。

正當麥當奴為如何改進香港警察部隊一籌莫展時，原印度信德邦 (Sind) 警務處副總監克雷 (Charles Creagh) 於1866年底被任命為香港警務處副總監。由於克雷在印度任職期間對他手下的錫克警察印象非常深刻，他立即建議麥當奴從印度旁遮普地區招募一些錫克人來港擔任警察^{④⑦}。麥當奴於1867年5月批准了克雷的建議，此後兩年共有約二百名錫克人從旁遮普被招募至香港充當警察^{④⑧}。儘管有報導稱這些錫克人完全無法勝任一些日常的警務工作，但他們在鎮壓暴亂和震懾犯罪份子方面的作用卻得到了廣泛的認可^{④⑨}。除此之外，殖民當局發現錫克警察在夜晚巡山、看守囚犯以及駐守政府建築物等方面也有着不錯的表現^{⑤⑩}。在之後的八十年中，香港警隊中的錫克人基本就從事着上述的工作^{⑤⑪}。

在香港引入錫克警察大概十年之後，海峽殖民地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以對其境內日益惡化的安全形勢進行評估^{⑤⑫}。1879年，該委員會向殖民政府提交了一份報告，建議全面改革海峽殖民地的警察部隊，改革內容包括建立警察學校以提高警察的教育水平、組織水警以消滅海盜、提高警員工資等等。在警隊人員組成方面，委員會認為殖民當局應當從倫敦招募具有豐富經驗的警官並且僱用一定數量的錫克人^{⑤⑬}。殖民地總督當即同意了這些建議，並正式向倫敦申請調派一位在印度供職、了解錫克人習性的警官來擔任海峽殖民地警察局的助理署長^{⑤⑭}。1881年，在這位助理署長的帶領下，165名錫克人陸續抵達新加坡和檳城^{⑤⑮}。由於這批錫克警察的到來，海峽殖民地警察部隊的整體表現在短短三年間得到了極大的提升^{⑤⑯}。

但像許多其他殖民地的情況一樣，錫克人在剛到新加坡等地時並沒有像普通警察般被部署在街道巡邏。他們被要求居住在軍事化的營房中，主要負責鎮壓暴亂、守衛政府機關、押送運鈔車等任務。數年之後，隨着錫克人逐漸熟悉了當地社會文化，他們才逐漸地出現在新加坡的各主要街道上負責執勤^{⑤⑰}。

乍一看，新加坡和香港兩地在招募錫克警察一事上似乎並沒有太多的交集。至於為甚麼這兩個殖民地都選擇了招募錫克人來當警察，學者更多地指出了兩地在社會背景上的相似之處：首先，新加坡和香港兩地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都存在着影響力極大的秘密社團，這些秘密社團所從事的走私和暴力犯罪等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威脅到了殖民當局的統治。為了更有效地遏制秘密社團，兩地政府都迫切地希望加強自身的警備力量^{⑤⑱}；其次，因為從歐洲本土招募而來的警察既昂貴又不適應當地環境，殖民當局嘗試招募馬來人和來自印度南部地區的人充當警察^{⑤⑲}。然而，英國人很快便發現馬來人和南印度人不能勝任警察的工作。香港政府的報告指出南印度人非常易於接受賄賂並時常與本地人發生衝突^{⑤⑳}；海峽殖民地政府則認為南印度人和馬來人無法處理複雜的案件^㉑。此外，兩地殖民當局均認為華人因其與當地秘密社團緊密的關係而不應被招募進警察部門^㉒。1872年海峽殖民地立法委員會的一份備忘錄聲稱：「華人因其太過緊密的裙帶關係而不應被聘用為警察。」^㉓僅僅一年

之後，香港警察總監梅理 (Charles May) 告訴警備委員會他絕不會在警隊中聘用華人⁶⁴；再者，香港和新加坡的居民主要以華人為主，而華人對於身材高大、滿臉鬍鬚、戴頭巾的錫克人又存在着普遍的恐懼心理。因而為了更有效地控制當地華人，兩地似乎不約而同地決定部署錫克警察⁶⁵。

儘管上述兩地的相似性可以部分地解釋香港和新加坡錫克警隊建立的原因，但殖民地之間的聯繫以及這些聯繫對各地產生的影響卻被學者所忽視。實際上，就像英帝國其他地區一樣，香港和新加坡這兩個殖民地之間的人員、情報和制度的交流也是非常頻繁的。當香港警察局在1883年聲稱要招募一位警官時，海峽殖民地向香港推薦了在新加坡供職並具有專門法律知識的一位候選人⁶⁶。儘管香港警察局認為該候選人因為不懂華語而無法勝任該工作，但還是決定聘用他，條件是他需要在一年之內掌握華語⁶⁷。在另一個例子中，海峽殖民地警務處的督察馬克思維爾 (Richard W. Maxwell) 在1883年被調任到了香港擔任警務處總監⁶⁸，而其升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在1879年的一場暴動中率領約二十名錫克警察成功地驅散了人群⁶⁹。此外，他在新加坡時也積極提議讓半軍事化的錫克警察執行民事巡邏任務⁷⁰。

另一方面，海峽殖民地的警察也受到了來自香港的影響。1870年，時任署理港督威菲路向海峽殖民地推薦一位警官賴斯 (Fitzroy Rice)。在推薦信中，威菲路強調了賴斯在香港供職時的優異表現，希望海峽殖民地能夠考慮讓他擔任檳城警隊的副署長一職⁷¹。在1890至1891年期間，海峽殖民地計劃增強其警備力量，並因此從香港招募了約五十名華人警察⁷²。由於香港當時在每日晚間10點30分之後便施行宵禁政策，從而有效地降低了犯罪率，海峽殖民地當局也隨之仿效，並在1895年完全引入了香港的這套制度⁷³。

上述的這些互動和交流也自然影響到了兩地在招募錫克警察時的決策。據前文所述，克雷早在1868年就將錫克人招募至香港警隊。由於在阻遏犯罪和鎮壓暴亂方面表現非常出色，香港政府對於錫克警察感到滿意。1878年港督軒尼斯 (Pope Hennessy) 在一份致辭中表示香港警察是英帝國殖民地中最好的，而錫克警察則是整個警隊的基石⁷⁴。錫克警察在香港的表現後來甚至被寫入了教科書中，以供其他殖民地官員參考⁷⁵。由於這樣的宣傳效果，各地紛紛仿效香港警務處的機制，並開始招募錫克警察。正如英國阿伯丁大學 (University of Aberdeen) 教授傑克遜 (Isabella Jackson) 所說：「如果印度是英帝國在印度洋地區從事殖民活動的一個中心的話，那麼香港則是其在遠東殖民擴張的另一個中心。」⁷⁶

海峽殖民地的錫克警察部隊正是仿效香港而組建起來的。1870年代末，由於海峽殖民地的警察部隊非常腐敗和低效，要求改革的呼聲不絕於耳⁷⁷。又因為香港與海峽殖民地在人口構成以及環境等方面都非常相似，兩地警察面對的挑戰也大同小異，海峽殖民地當局便將注意力轉向了香港，試圖尋求一些能夠改善當地治安的良方⁷⁸。得益於兩地頻繁的交流互動，海峽殖民地的官員對於香港警隊的情況了解得相當充分。早在1868年香港警隊開始招募錫克警察時，海峽殖民地當局就已經開始關注這一試驗。兩年之後，就關於是否也在新加坡部署錫克警察進行討論時，無論是支持方還是反對方都援引

香港錫克警察的表現作為論據。支持者認為錫克人有效地維護了香港的治安；而反對者則堅稱香港的錫克警察對於警務工作一無所知，他們的工作會加深本地人與殖民當局間的矛盾^㉑。在1870年代，香港警務處計劃招募華人警察以增強其實力。這一消息很快便傳到了新加坡，政府就是否也在海峽殖民地引入華人警察這一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討論^㉒。

實際上，在十九世紀後期，海峽殖民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將香港作為一個模版來看待。儘管某些殖民官員對於這種過份崇拜表達出了憂慮，但大多數海峽殖民地的官員仍然在之後數十年中視香港經驗為瑰寶^㉓。由於長期受到「崇港」思維的影響，當1879年海峽殖民地決定改革其警隊時，負責籌備改革事宜的警備委員會自然而然地將注意力轉向了香港。經過一番調查，警備委員會發現香港警隊是由西捕、華捕和印捕（錫克警察）三種人員構成，而這種混合編制不但提升了警隊的效率，更重要的是減低了成本和警隊內的腐敗。認識到這些優勢，警備委員會立刻建議當局以香港為模版對海峽殖民地的警隊進行全方位的重組^㉔。又因為當時的海峽殖民地警隊中已經有了西捕和華捕，所以引入錫克人便成為了整個重組計劃的重中之重。在參考了香港錫克警察的表現之後，警備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都認為在海峽殖民地引入一定數量的錫克警察是利大於弊的^㉕。至於新招募警察的工資，警備委員會也參考了香港的情況，建議給予歐洲警員的月薪與香港持平，即40至100墨西哥銀元，而給予錫克警員的薪金則略少於香港，維持在每月9至30銀元^㉖。

由於錫克移民網絡的存在，各地警員薪金水平的信息很快便傳播到了各個錫克聚居區。在得知新加坡提供的薪水要少於香港之後，愈來愈少的錫克人選擇新加坡作為他們的移民目的地。到了十九世紀末，由於香港在酬勞上的優勢，在新加坡工作的錫克警員日漸不滿，要求漲薪的呼聲此起彼伏^㉗。為了避免發生警察罷工的事件，新加坡政府於1900年決定改革原有政策，全面提高錫克警員的福利水平。這一消息很快便通過移民網絡在錫克人之中傳播了開來。香港的錫克警員隨即向當局表達了不滿，並認為他們也應當享有與新加坡相同幅度的薪金增長。為預防警隊士氣受損以及錫克警員流失，香港當局最終在1901年同意為錫克警員加薪^㉘。

隨着錫克警員數量在香港和新加坡的不斷增加（表1），兩地都出現了規模達數百人的錫克社群。為了使這些錫克人盡快融入當地生活並開展工作，專為錫克人設立的警察學校以及錫克廟（Gurdwara）相繼建立。跨國網絡中的知識和信息流動在這些設施的建立過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表1 香港與新加坡的錫克警員數量，1890-1930年

	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香港	227	366	378	477	750
新加坡	229	310	378	375	552

數據來源：Hong Kong Government Reports Online (1842-1941), <http://sunzi.lib.hku.hk/hkgro/index.jsp>; CO 275 series, Annual Reports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lice Force.

香港的錫克警校在1868年創立，起初主要教授射擊、英語和華語課程^⑦。之後的數十年間，學校規模不斷擴大，而教學內容也擴展到擒拿術、警務常識、醫療急救等方面^⑧。這種錫克警校模式通過人員和信息流動傳播到新加坡。當新加坡籌備建立錫克警隊時，警備委員會參考了香港的模式，建議當局也建設一所學校用作專業技能和語言的培訓^⑨。殖民政府接受了這一建議，在1881年為新招募的錫克警員單獨設立了一所警校。而警校的培訓內容則是完全模仿香港的經驗，以射擊和語言課程為主，輔之以警務常識教育^⑩。

由於錫克民族是一個宗教民族，錫克教在其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極其重要的角色，因此錫克教的宗教儀式和習俗也被移民帶到了新的聚居地。但由於資金上的限制，在整個十九世紀後半葉，海峽殖民地和香港的錫克社群都沒有正規的錫克廟供信徒進行宗教活動。為紀念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周年，海峽殖民地的錫克警員計劃於1900年前後在檳城興建一座錫克廟。檳城修建錫克廟的消息迅速通過錫克移民網絡傳播到了新加坡、香港和馬來亞半島，各地的錫克社群對此給予了熱烈的回應並發動了募捐，其中香港一地的錫克社群就捐贈了600港幣。1901年錫克廟建成之後，檳城迅速成為了東南亞錫克移民進行宗教活動的中心^⑪。鑒於檳城的錫克廟極大地增強了東南亞錫克移民的凝聚力，更讓他們得以進行頻繁的宗教活動，香港的錫克人也開始籌劃建立一座錫克廟。1902年，香港的第一座錫克廟在灣仔落成，建築資金除了在香港的錫克人之中募集外，也得到了海峽殖民地錫克移民的支持^⑫。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連接了印度、香港和新加坡的跨國網絡促進了人員、機制和信息的流通，並因此為錫克警隊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出現和發展創造了條件。一方面，這種流通不僅僅影響了殖民當局建立錫克警隊的決策，更為新加坡和香港兩地錫克警隊的發展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上述跨國網絡也被錫克人用來相互聯絡與幫助，共享移民信息，優化自



1902年，香港的第一座錫克廟在灣仔落成。（圖片由作者提供）

身在移民時的選擇。而錫克人的移民選擇反過來又影響了殖民地警隊的構成，並促使各殖民當局根據錫克人的需求而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

隨着印度民族主義運動在二十世紀初期的興起，跨國網絡對於各殖民地政策的影響逐漸擴展到了政治領域。民族主義者開始通過跨國網絡傳播反殖民主義思想，甚至在各殖民地建立起反英團體。以下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族主義是如何透過跨國網絡來運作的。辛格 (Bhagwan Singh) 於1910年到馬來亞霹靂州 (Perak) 的錫克廟擔任神父。但不到一年的時間，他便因向當地錫克移民宣傳反英思想而被當局解職。通過其他錫克移民的介紹，他被邀請到香港擔任錫克廟的神父。不久，香港政府便發現他並不專注於向錫克移民講解錫克教，而是通過曲解錫克教教義鼓動信徒從事反英活動，因此在1913年將其辭退。辛格在1913年離開香港，利用移民網絡的關係前往加拿大溫哥華，並在當地組織民族獨立運動，在數月之後因顛覆政府罪被要求離境。但他並未回到印度，而是去了巴黎繼續從事印度民族解放運動⁹³。

實際上，辛格的行動軌迹在當時的印度民族主義份子之中非常普遍，並因此給各殖民當局帶來了相當大的政治風險⁹⁴。錫克警察作為維持殖民地治安的骨幹尤其受到了民族主義者以及香港和新加坡殖民當局的關注。民族主義者嘗試鼓動手握武器的錫克軍警從事反英運動，而殖民當局則加緊了對於其下屬錫克警隊的監控，並逐漸以本地人取代錫克人充當警察。這種監控與替代並行的策略直到二戰爆發才告結束⁹⁵。

在二戰中，香港與新加坡相繼被日本佔領。為拉攏印度民族主義者，大多數錫克警員得以繼續留在警隊供職。戰爭結束之後，英國恢復了在兩地的殖民統治。由於戰時曾與日本人合作，一些錫克警員受到了戰爭法庭的起訴，但大多數人則免於刑罰並回到了旁遮普。1947年印度與巴基斯坦從英國統治下獨立，居住在印巴兩國境內的錫克人也不再受英帝國管轄。基於這樣的原因，英國各殖民地也因此放棄了招募錫克警察的政策。至此，歷時近八十年之久的錫克警察制度走向了終點。



辛格在港期間通過曲解錫克教教義鼓動信徒從事反英活動 (圖片由作者提供)

五 結語

1901年2月，上海工部局巡捕房緊急要求當局為其錫克警察加薪。其給出的理由是，巡捕房中的錫克警察因為獲悉香港錫克警員的薪水得到了提升而心生不滿，計劃罷工。為了安撫錫克僱員並維持上海在錫克人招募市場上的競爭力，工部局同意為其錫克警察加薪^①。而根據上文我們可以得知，香港為其錫克警員加薪的決定又是迫於新加坡方面的加薪政策而作出的。實際上，本文所要強調的就是這種跨國網絡下的多層級互動，以及這種互動是如何影響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行為決策的。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鐵路、遠洋輪船以及電報等交通通訊工具得到了大力推廣。運輸工具可以在短時間內將人員輸送到海外，而電報等通訊工具則為不同地區之間的信息共享提供了平台。得益於這些技術，原本鬆散的英帝國各地區間的聯繫逐漸緊密了起來。英國軍官通過鐵路和輪船等交通工具頻繁地穿梭於殖民地之間，殖民管理經驗也隨着這些殖民官員的流動而傳遞，而電報和印刷品的流通則使得各地區之間的相互了解得以加深。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有關「軍事族群」的知識、使用錫克警察的經驗以及招募錫克人的信息才得以在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傳播開來。而錫克人則充分利用了現代交通通訊技術，大規模地移民海外從事經濟、宗教和政治活動。錫克人的跨國流動，不管在經濟社會層面上還是政治層面上，又反過來影響了殖民當局的政策制訂與實施。

本文認為，在這樣一種跨國聯繫日益緊密的背景下，仍然僅僅關注殖民地母國（中心）與殖民地（邊緣）之間的線性互動就顯得有失偏頗了。全球史研究方法所倡導的跨國網絡視角有助於更加客觀地展現殖民帝國的運行機制。本文更強調，跨國網絡視角不應只限於以自上而下的角度，去研究殖民者是怎樣通過跨國互動來實現殖民地治理的；還應該包括一個自下而上的角度，探討被殖民者的跨國流動是怎樣塑造了殖民帝國及其網絡。這種多層級的全局史研究不僅僅是要在地理上將殖民地母國邊緣化，更重要的是要將「沒有歷史的人民」從歐洲中心主義的敘事框架中解放出來。

註釋

① “Ceylon's Volunteers for the Jubilee”, *The Times of India*, 25 May 1897.

② 這裏所謂的「多層級網絡」，一方面是指在這一網絡之中流動的因素非常多樣化，即包括了人員、商品、知識與制度等各個方面；另一方面也表明這一網絡並非是完全由西方殖民者所創造和控制。殖民者可以通過這一網絡來加強他們對當地社會的控制以及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被殖民者也可以利用這一網絡來滿足他們自身的訴求，不管這一訴求是經濟性的（海外勞工）還是政治性的（民族主義者）。

③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有一套帝國主義史叢書（*Studies in Imperialism*），目前為止已經出版了數十本有關殖民帝國史的專著和論文集，其中亦包括兩本有關殖民警察的論文集，參見David M. Anderson and David Killingray, eds., *Policing*

the Empire: Government, Authority and Control, 1830-194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olicing and Decolonisation: Politics,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ce, 1917-65*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④ 五卷本的牛津英帝國史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參見Wm. Roger Louis,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5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1999)。

⑤ 一些學者認為英帝國境內所有的殖民警察在組織機構和行為規則上都源自於1839年在愛爾蘭建立的愛爾蘭皇家巡捕(Royal Irish Constabulary)。該警察部隊的建立是為了根除當時遍布愛爾蘭的農民暴動，並加強英國在當地的統治。因此與執行民事任務的英國警察不同，愛爾蘭皇家巡捕被要求居住在軍事營房內，裝備有殺傷性武器，並嚴格實行異地招募原則。一般認為愛爾蘭皇家巡捕的這些措施之後被英帝國各殖民地所效仿，因此成為了殖民警察的鼻祖。有關愛爾蘭皇家巡捕的建立及其主要特徵，參見Galen Broeker, *Rural Disorder and Police Reform in Ireland, 1812-36*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0); Stanley H. Palmer, *Police and Protest in England and Ireland, 178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有關愛爾蘭模式是如何傳播到各殖民地的論述，參見Charles J. Jeffries, *The Colonial Police* (London: M. Parrish, 1952); Clive Emsley, "Marketing the Brand: Exporting British Police Models 1829-1950", *Policing: A Journal of Policy and Practice* 6, no. 1 (2012): 43-54。

⑥ 參見Brian Stoddart, "Sport,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 Response in the British Empi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0, no. 4 (1988): 649-73; Douglas M. Peers and Nandini Gooptu, eds., *Indi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有關「衝擊—回應」模式的具體應用，參見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3-25。

⑦ 自從1980年代以來，學者習慣將那種使用自上而下、中心—邊緣方法的研究稱為「舊殖民主國史」，而將那些着重強調殖民地對殖民地母國影響的研究稱為「新殖民主國史」，參見Tony Ballantyne, "Introduction: Debating Empire", *Journal of Colonialism and Colonial History* 3, no. 1 (2002): 1-21。

⑧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Christopher L. Miller, *Blank Darkness: Africanist Discourse in Fren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Sara Suleri, *The Rhetoric of English In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Mary L.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3); Gayatri C.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2)。

⑨ Ann L. Stoler and Frederick Cooper, "Between Metropole and Colony: Rethinking a Research Agenda", in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ed. Frederick Cooper and Ann L. Stole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23; 亦可參見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Ltd., 1986); Stephen Howe, *Anticolonialism in British Politics: The Lef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18-196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⑩ Mike Brogden, "The Emergence of the Police—The Colonial Dimension",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 27 (1987): 4-14; Surajit C. Mukhopadhyay, "Importing Back Colonial Policing Syste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yal Irish Constabulary, Indian Policing and Militarization of Policing in England and Wales", *Innovation* 11, no. 3 (1998): 253-65。

⑪ Ann L. Stoler and Frederick Cooper, "Between Metropole and Colony", 1-58。

- ⑫ 有關全球史在 1980 年代興起的背景，參見 Jerry H. Bentley, *Shapes of World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Scholarship*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96)。有關殖民帝國史的全球史轉向，參見 Tony Ballantyne and Antoinette Burton, "Introduction: Bodies, Empires, and World Histories", in *Bodies in Contact: Rethinking Colonial Encounters in World History*, ed. Tony Ballantyne and Antoinette Burt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5; Antoinette Burton, *Empire in Question: Reading, Writing, and Teaching British Imperi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75-92。
- ⑬ 目前有關全球史的定義及其主要特徵，學界內仍然存在爭議，但大多數學者也都認為全球史的研究對象應當是跨區域的人員、商品和文化交流，參見 C. A. Bayly et al., "AHR Conversation: 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no. 5 (2006): 1441-64。
- ⑭ John McCracken, "Coercion and Control in Nyasaland: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a Colonial Police Force",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27, no. 1 (1986): 129-38.
- ⑮ Martin Thomas, *Violence and Colonial Order: Police, Workers and Protest in the European Colonial Empires, 1918-194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8.
- ⑯ James B. Wolf, "Asian and African Recruitment in the Kenya Police, 1920-1950",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6, no. 3 (1973): 401-12.
- ⑰⑱ John Willis, "Colonial Policing in Aden, 1937-1967", *Arab Studies Journal* 5, no. 1 (1997): 57-91; 61.
- ⑲ 畢可思 (Robert Bickers) 有關近代上海租界的英國警察的研究可能是個例外，參見 Robert Bickers, *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London: Penguin, 2004)。
- ⑳ John F. Laffey, "Imperialist Divided: The Views of Tonkin's Colons before 1914", *Histoire Sociale* 10, no. 19 (1977): 92-113; Nicholas Thomas, *Colonialism's Culture: Anthropology, Travel and Gover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㉑ Leon Co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Surv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 to 1900* (Locust Valley, NY: J. J. Augustin, 1959); Wilfred Blyt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Lee Poh Ping,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Carl A. Trocki, *Prince of Pirates: The Temenggo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ohor and Singapore, 1784-1885* (Kent Ridg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9); Mark Lau Fong, *The Sociology of Secret Societies: Study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Singapore and Peninsular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Tan Pek Leng,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and Labour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raits Settlements", *Kajian Malaysia* 1, no. 2 (1983): 14-48; Owen Rutter, *The Pirate Wind: Tales of the Sea-Robbers of Malay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Yiu Kong Chu, *The Triads as Business* (London: Routledge, 2000).
- ㉒ David J. Starkey, E. S. van Eyck van Heslinga, and J. A. de Moor, eds., *Pirates and Privateer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War on Trade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97); Emrys Chew, "Militarized Cultures in Collision: The Arms Trade and War in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USI Journal* 148, no. 5 (2003): 90-96; Eric Tagliacozzo, *Secret Trades, Porous Borders: Smuggling and States along*

a Southeast Asian Frontier, 1865-1915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⑳ 在1905年之前，海峽殖民地的主要貨幣是墨西哥銀元。

㉑ 參見英國殖民地部 (Colonial Office) 檔案CO277/14, Revenue, Expenditure, and Balances, 1880, C20。本文引用的殖民地檔案得益於香港大學圖書館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之館藏。

㉒ CO 277/28, Civil Establishments, 1889, L76.

㉓ 有關歐洲人在熱帶地區的高死亡率，參見Philip D. Curtin, *Death by Migration: Europe's Encounter with the Tropical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有論者更認為熱帶的疾病以及氣候致使歐洲人從來沒有成功將這些地區的殖民地轉化為猶如美洲或澳洲一樣的永久定居地，參見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㉔㉕ CO 275/23, Report of the Police Commission, 1 September 1879, cclxxviii; cclxxi; cclxxviii.

㉖ 所謂當地人「不可靠」的觀念實際完全是歐洲殖民者的故意曲解。只有將被殖民人民描述為「不可靠」、「善變」、「墮落」等等，歐洲人對於殖民地的統治才具有合法性。參見Robert Stam and Louise Spence, "Colonialism, Racism and Representation", *Screen* 24, no. 2 (1983): 2-20。

㉗ 在1870年代，海峽殖民地一個普通警察的月收入為6墨西哥銀元，低於當地一個體力勞動者的月收入，參見CO 275/23, Report of the Police Commission, 1 September 1879, cclxxi。

㉘㉙ Howard Johnson, "Social Control and the Colonial State: The Reorganisation of the Police Force in the Bahamas 1888-1893", *Slavery & Abolition: A Journal of Slave and Post-Slave Studies* 7, issue 1 (1986): 49-51; 53.

㉚ Andrew Burton, "'Brothers by Day': Colonial Policing in Dar es Salaam under British Rule, 1919-61", *Urban History* 30, issue 1 (2003): 70.

㉛ Robert J. Blyth, *The Empire of the Raj: India, Easter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1858-1947*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Thomas R. Metcalf, *Imperial Connections: India in the Indian Ocean Arena, 1860-192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在本研究中，「印度人」泛指英帝國治下的南亞次大陸的人民，其中亦包括了今天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地。

㉜ 有關「軍事族群」理論的緣起和發展，參見Heather Streets, *Martial Races: The Military, Race, and Masculinity in British Imperial Culture, 1857-1914*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David Omissi, "'Martial Races': Ethnicity and Security in Colonial India 1858-1939", *War & Society* 9, issue 1 (1991): 1-27; Purushottam Banskota, *The Gurkha Connection: A History of the Gurkha Recruitment in the British Indian Army* (Jaipur: Nirala, 1994); Pradeep Barua, "Inventing Race: The British and India's Martial Races", *The Historian* 58, issue 1 (1995): 107-16; Kaushik Roy, *Brown Warriors of the Raj: Recruitment and the Mechanics of Command in the Sepoy Army, 1859-1913*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2008), 80-144。

㉝ Heather Streets, *Martial Races*, 1.

㉞ 有關錫克人身份的討論，參見Choor Singh, *Understanding Sikhism: The Gospel of the Gurus* (Singapore: Central Sikh Gurdwara Board, 1994); Richard G. Fox, *Lions of the Punjab: Culture in the Mak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Mehar S. Chaddah, *Are Sikhs a Nation?* (Delhi: Delhi Sikh Gurdwara Management Committee, 1982); W. H. McLeod, *The Evolution of the Sikh Community: Five Essay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Who is a Sikh?: The Problem of Sikh Identity* (Oxford: Clarendon, 1989)。

㉟ 在印度兵變期間，共有約23,000名錫克士兵選擇在英國一邊參加了戰鬥，參見David Omissi, *The Sepoy and the Raj: The Indian Army, 1860-1940*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King's College London, 1994), 6。有關錫克士兵在印度兵變中的戰鬥表現，參見Saul David, *The Indian Mutiny, 1857* (London: Viking, 2002)。

⑳ Heather Streets, *Martial Races*, 132-50. 有關「軍事族群」理論的手冊，參見Kaushik Roy, *Brown Warriors of the Raj*, 136-40。

㉑ James B. Wolf, "Asian and African Recruitment in the Kenya Police, 1920-1950", 404; Mathieu Deflem, "Law Enforcement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mperial Policing in Nyasaland, the Gold Coast and Kenya", *Police Studies* 17, issue 1 (1994): 53.

㉒ CO 129/153, From Whitfield to the Earl of Kimberley, 16 November 1871, 105-108.

㉓ Andrew J. Major, *Return to Empire: Punjab under the Sikhs and British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96), 126; Clive J. Dewey, "Some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Expenditure in British India: The Case of the Upper Sind Sagar Doab, 1849-1947", in *Arrested Development in India: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ed. Clive J. Dewey (Riverdale, MD: Riverdale Company, 1988), 123-42; J. Royal Rosenberry, *Imperial Rule in Punjab: The Conquest and Administration of Multan, 1818-1881* (New Delhi: Manohar Publications, 1987), 218.

㉔ Ian Talbot, *Punjab and the Raj, 1849-1947* (New Delhi: Manohar Publications, 1988), 12, 30.

㉕ 有關錫克移民網絡的具體闡述，參見Tony Ballantyne, *Between Colonialism and Diaspora: Sikh Cultural Formations in an Imperial Worl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9-33。

㉖ CO 129/10, Pottinger to Johnston, 8 June 1842, 236-37; CO 129/10, From Richard to Caine, 6 November 1843, 533-34. 有關早期香港皇家警察的信息，參見Colin Crisswell and Mike Watson,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Macmillan, 1982)。

㉗ CO 129/12, Davis to Colonial Office, 21 May 1846, 97-119.

㉘㉙ CO 129/120, MacDonnell to Colonial Office, 7 January 1867, 42-82.

㉚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23 May 1868, Hong Kong Government Reports Online (1842-1941), <http://sunzi.lib.hku.hk/hkgro/view/g1868/709436.pdf>, 198; CO 129/122, From MacDonnell to Duke of Birmingham & Chandos, 8 June 1868, 135-40.

㉛ CO 129/145, Whitfield to Colonial Office, 28 September 1870, 414-22.

㉜㉝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6 April 1870, Hong Kong Government Reports Online (1842-1941), <http://sunzi.lib.hku.hk/hkgro/view/g1870/704576.pdf>, 188.

㉞ Norman Miners, "The Localization of Hong Kong Police Force, 1842-1947",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18, issue 3 (1990): 310; K. N. Vaid, *The Overseas Indian Communi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2), 38-39.

㉟ CO 275/23, Report of the Police Commission, 1 September 1879, cclxv. 有關調查委員會的成立，亦可參見"Summary of the Week",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14 November 1878; "The Government Gazette, 3rd Jan",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11 January 1879。

㊱ CO 275/23, Report of the Police Commission, 1 September 1879, cclxxix. 另參見"Topics of the Day",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28 November 1879; "Police Commission Report",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31 October 1879。

㊲ "The Police Force",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14 June 1880.

㊳ CO 275/27, Report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lice Force, and on the State of Crime, for the Year 1881, 20 April 1882, 95; "Summary of the Week",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28 March 1881; "Summary of the Week",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1 September 1881; "News of the Week",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12 November 1881; "Monday, 28th November",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3 December 1881; "Article 7", *The Times of India*, 10 March 1881.

⑤⑥ CO 275/27, Report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lice Force, and on the State of Crime, for the Year 1881, 20 April 1882, 98; CO 275/28, Report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lice Force, and on the State of Crime, for the Year 1882, 4 June 1883, 139-41; CO 275/29, Report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lice Force, and on the State of Crime, for the Year 1883, 4 June 1884, C247.

⑤⑦ CO 275/36, Annual Report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lice Force, and on the State of Crime, for the Year 1889, 19 March 1890, 287; CO 275/40, Annual Report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lice Force, and on the State of Crime, for the Year 1890, 9 March 1891, 517; CO 275/42, Annual Report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lice Force, and on the State of Crime, for the Year 1891, 1 March 1892, 142.

⑤⑧ 香港的警察數量從1849年的131名增加到了1874年的491名，在二十五年中增加了接近四倍，參見Norman Miners, "The Localization of Hong Kong Police Force, 1842-1947", 296-315。新加坡在同一時期也大幅增加了其警備實力，參見Walter Makepeace, Gilbert E. Brooke, Roland St. J. Braddell, eds.,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vol. 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50。

⑤⑨ 在1870年代的海峽殖民地，90%以上的警察都是馬來人和南印度人，參見CO 275/15, Straits Settlements Legislative Council Proceedings, 20 June 1872, 17-28。同一時期，絕大多數香港的警察都是歐洲人或印度人，參見Norman Miners,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1842-1947", 296-315。

⑥⑩ CO 129/66, From Stocks to Merivale, 18 December 1857, 314-37; CO 129/122, From MacDonnell to Duke of Birmingham & Chandos, 9 May 1867, 13-26.

⑥⑪ CO 275/15,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Minutes, 13 June 1872, 10-16.

⑥⑫ Lee Poh Ping,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33.

⑥⑬ CO 275/15, Straits Settlements Legislative Council Proceedings, 20 June 1872, 17。對於東南亞和香港的華人與當地秘密社團的聯繫，參見Peer M. Akbur, *Policing Singapore in the 19th & 20th Centuries* (Singapore: Singapore Police Force, 2002), 32。

⑥⑭ CO 129/164, Report of Police Commission, 31 July 1873, 248-67.

⑥⑮ 香港和新加坡兩地的情況，參見"The Edge of the Empires", *Straits Times Weekly Issue*, 2 August 1889; "A Few Weeks with the Malays", *Straits Times Weekly Issue*, 2 April 1883; Emily Innes, *The Chersonese with the Gilding Off*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74.

⑥⑯ CO 273/122, 9 August 1883.

⑥⑰ CO 273/122, 11 December 1883.

⑥⑱ CO 273/122, Branston to Weld, 2 October 1883.

⑥⑲ "The Recent Riots in Larut",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18 October 1879.

⑦⑩ CO 275/31, Annual Report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lice Force, and on the State of Crime, for the Year 1885, 31 March 1886, C214.

⑦⑪ CO 273/41, 21 December 1870; CO 129/146, From Whitfield to the Earl of Kimberley, 28 November 1870, 238-47.

⑦⑫ CO 275/40, Annual Report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lice Force, and on the State of Crime, for the Year 1890, 9 March 1891, 515; CO 275/42, Annual Report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lice Force, and on the State of Crime, for the Year 1891, 1 March 1892, 142.

⑦⑬ CO 275/49, Annual Report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lice Force, and on the State of Crime, for the Year 1894, 1 February 1895, 17; CO 275/50, Annual Report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lice Force, and on the State of Crime, for the Year 1895, 7 February 1896, 35.

⑭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9 March 1878, Hong Kong Government Reports Online (1842-1941), <http://sunzi.lib.hku.hk/hkgro/view/g1878/687997.pdf>, 89.

⑮ Alfred H. Bingley, *Caste Handbooks for the Indian Army: Sikhs* (Simla: Government of India Printing, 1899); A. E. Barstow, *Handbooks for the Indian Army: Sikhs* (New Delhi: Government Press India, 1940).

⑯ Isabella Jackson, "The Raj on Nanjing Road: Sikh Policemen in Treaty-Port Shanghai", *Modern Asian Studies* 46, no. 6 (2012): 1672-1704.

⑰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2 March 1867, Hong Kong Government Reports Online (1842-1941), <http://sunzi.lib.hku.hk/hkgro/view/g1867/711041.pdf>, 59.

⑱ "The Police Force",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3 June 1870.

⑲ "The Hongkong Police Commission",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7 September 1872.

㉑ 有殖民官員批評海峽殖民地政府總是將香港想像得過於完美而忽視了其存在的很多問題。參見"Police Commission Report",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31 October 1879。

㉒ "The Hong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4 January 1879; "Topics of the Day",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28 November 1879.

㉓ CO 275/23, Report of Police Commission, 1 September 1879, cclxxx; "From the Daily Times, Oct. 3rd",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7 October 1879.

㉔ CO 275/55, Report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lice Force, and on the State of Crime, for the Year 1897, 28 February 1898, 61.

㉕ CO 129/305, 13 May 1901, 103.

㉖ Administrative Report, "Report of the Captain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 for the Year 1921", Hong Kong Government Reports Online (1842-1941), <http://sunzi.lib.hku.hk/hkgro/view/a1921/443.pdf>, K17.

㉗ "Police Commission Report",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8 November 1879.

㉘ CO 275/27, Report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lice Force, and on the State of Crime, for the Year 1881, 20 April 1882, 96.

㉙ "Sikhs in Penang", *The Straits Times*, 1 September 1899; "Diamond Jubilee Sikh Temple in Penang",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 September 1899; "Shipping News",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7 June 1901.

㉚ "Sikh Temples", *The China Mail*, 14 June 1901; "New Sikh and Hindu Temple",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12 May 1902; "Opening of a Sikh Temple in Hongkong", *The Hong Kong Weekly Press*, 19 May 1902.

㉛ CO 129/410, From Captain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 Hong Kong to the Inspector-General of Police, Punjab, 17 June 1913, 415.

㉜ Sugata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㉝ Norman Miners, "The Localization of Hong Kong Police Force, 1842-1947", 296-315.

㉞ 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十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723。